

秦蕙田《五禮通考》撰作特點析論

楊志剛*

摘要

本文對於《五禮通考》撰作特點的析論，涉及學術淵源、思想傾向、體裁體例、纂修緣起及過程、參加成員、相關背景與資源等。目的在於闡明《五禮通考》在禮學史上的意義和地位，探析如此鴻篇巨制的價值、成因，進而概括該書所體現的禮學著述形態上的新特點，分析其意義及局限。文章指出，《五禮通考》是「通禮」，它既體現了一種新的禮書編撰形式，也包含著禮學的一種新形態。秦蕙田在禮學史上的最大業績，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一著述形態。

關鍵詞：秦蕙田 《五禮通考》 撰作特點 會通 著述形態

*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中國古代禮學著述中，篇幅最長、內容最多者，當推江蘇金匱（今無錫）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1702—1764年）的《五禮通考》。以臺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而言，《五禮通考》佔據了其經部第129至第136冊近8冊的容量，共計7317頁。若以每頁670字算，總字數在490萬字以上。¹可資比較的是，同在這套影印的四庫全書中，同屬禮學著述中部頭大的如清初徐乾學《讀禮通考》，只有3冊、2349頁；宋代衛湜《禮記集說》，4冊、3217頁；清代《欽定禮記義疏》，3冊、2162頁。

《五禮通考》不僅卷帙浩繁，且在禮學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時彥評它為「數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獨冠古今」。³以後曾國藩贊其「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並將秦蕙田列為自古以來32位聖哲之一，重點推薦給後代。⁴《清史稿》卷三〇四為秦蕙田列傳，稱此書「博大閎遠，條貫賅備」。經過多年的寂寥和漠然以後，今人重新將目光投向《五禮通考》。1994年，臺灣聖環圖書公司依據王欣夫教授收藏的原刊初印樣本照片影印《五禮通考》（以下簡稱聖環本），並在「出版說明」中強調：這部「禮學傑作」，對於瞭解我國古代禮制沿革，「實為最切實用之書」。近年來，已有兩篇專題論文問世，介紹和探討其人其書。研究者指出，此「可謂中國古代禮學集大成著作」，⁵或以為「成書尤非易事，其成就亦斐然可觀」。⁶

本文主要關注《五禮通考》的撰作特點，並將考察的視角集中在：一、古代禮學的演變尤其是若干重要線索的梳理，籍此對《五禮通考》在禮學史上的意義和地位有所闡明。二、秦蕙田的生平經歷、文化背景與其學術撰著之間的關係，由此深入探析如此鴻篇巨制的成因和價值。在此基礎上，試圖進一步概括《五禮通考》所體現的禮學著述形態上的新特點，分析其意義及局限。

¹ 這8冊的頁數分別是：1163頁，1101頁，989頁，1084頁，901頁，548頁，734頁，797頁。其中第134冊為合集，另有340頁，收入了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等5種著述。關於字數，是按原刊本每半頁8行、每行21字計算，影印本縮印為四合一十六開本。鑒於其中有不少以夾註形式小字雙行騰抄，所以縮印本以平均值每頁670字計算，絕不高估，總字數490萬字實屬保守估算。

² 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如不特別揭舉，本文即依據此本。

³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五禮通考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432，頁626。

⁴ 〈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頁247-252，岳麓書社1986年。

⁵ 王煒民：〈秦蕙田與《五禮通考》〉，《陰山學刊》1999年3月號，第12卷第1期，頁47-52。

⁶ 林存陽：〈秦蕙田與《五禮通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5年12月號，第3卷第4期，總10期，頁25-30。

一、

至少有 4 部前人的著作，給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以重要的啟發和影響。

《儀禮經傳通解》 這是朱熹曾反復念叨並多次安排人手編撰的「禮書」，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晚年確定此名，並修葺親定其中的二十三卷。後由弟子黃幹、楊復等續完。據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年甫逾冠的他即與同好共同研討「三禮」，並特別留意於「朱子當日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唐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證，以為當代之典」。可他又感慨：「今所觀《經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未足為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部。」於是，觸動了他參照《儀禮經傳通解》的方法去探究禮學，「乃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婚、賓祭、宮室、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抵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徑，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復，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⁷顯然，對於秦蕙田步上研治禮學之路，並一生孜孜以會通、考辨的方法對禮學加以全面的清理，《儀禮經傳通解》起到了引領的作用。

《讀禮通考》 徐乾學（1631—1694 年）的這部研討古代喪禮的大作，秦蕙田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1747-1748 年）丁父憂回籍治喪時讀到的。後出的《四庫全書總目》稱：「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該著的特點在於，「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仿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⁸讀見此書，秦蕙田既興奮又深感不足，以為它「規模義例俱得朱子本意，唯吉、嘉、賓、軍四禮尚屬闕如」。遂啟動了《五禮通考》的撰作。他「陳舊篋，置抄胥，發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⁹盧文弨（1717—1795 年）〈五禮通考跋〉

⁷ 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五禮通考》卷首。

⁸ 《四庫全書總目·讀禮通考提要》。提要還指出：「乾學又欲並修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168 頁。

⁹ 同注 7。

亦言：「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遍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¹⁰

《通典》 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系統記載歷代制度的通史，分八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¹¹共 200 卷，禮門占了 100 卷，按禮典目錄（1 卷）、吉禮（14 卷）、嘉禮（18 卷）、賓禮（2 卷）、軍禮（3 卷）、凶禮（27 卷）、開元禮纂類（35 卷），分述禮制因革。須加留意的是，《開元禮》原吉、賓、軍、嘉、凶的「五禮」次序，被《通典》的纂類改作：吉、嘉、賓、軍、凶，並成為「五禮」的一般性次序。《五禮通考》以《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五禮」為綱，卻不採用它的排序，而以《通典》為據。

《文獻通考》 成書在元初的《文獻通考》以《通典》作藍本，不過對於中國典章制度的理解更寬泛，其分類與《通典》也有所別。《文獻通考》分二十四考（門），其中「十九門皆因《通典》而離析之，……五門則《通典》所未及也。」¹²作者馬端臨對中國典制的總體把握及分類，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及參考意義。現代碩儒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批評《五禮通考》分類「未當」時，就舉《文獻通考》作為比照的對象。¹³《五禮通考·凡例》曾對《通典》、陳祥道《禮書》、《儀禮經傳通解》和《文獻通考》進行比較，由此可見，當時秦蕙田在謀劃商討《五禮通考》的篇章內容時，對《文獻通考》的門類結構一定細加考察，以資鏡鑒。曾國藩曾將《五禮通考》與「三通」（即《通典》、《文獻通考》及鄭樵《通志》）並論，以為可成「四通」，由此招來章太炎的微詞。¹⁴

在書寫的體例格式上，《文獻通考》對《五禮通考》也留下烙印。《文獻通考·自序》曾解釋：引古經史為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是為「文獻通考」。¹⁵「文」頂格書寫，「獻」降一字書寫，以示區別。作者的按語則再低一字書寫。《五禮通考》則將徵引之材料分為三類：頂格書寫，降一字書寫，少數降二字書寫。類似分頂格與降格書寫的形式，《儀禮

¹⁰ 同注 3。

¹¹ 茲沿用《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提要》的說法，見中華書局影印本頁 693。《通典》將「兵」、「刑」析而為二。

¹² 《四庫全書總目·通典提要》。

¹³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頁 154-156，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¹⁴ 同注 13。

¹⁵ 此語亦為《四庫全書總目·文獻通考提要》所援引。

經傳通解》、《讀禮通考》曾予採用。¹⁶《五禮通考》及《讀禮通考》還因襲了以按語形式來陳述作者的觀點，書寫格式上為降四字，顯得較為醒目。

很巧，以上四部書及《五禮通考》，書名中都有一個「通」字。這大概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宋以降，在中國知識界，逐步形成了一種講求「會通」的學術取向；並且又漸漸延展到禮學領域，特別是到了清朝。自然，各有各的「會通」特點。這裏集中討論《五禮通考》，先擇其三點論述。

（一）融匯「三禮」，《儀禮》、《周禮》並重

對《周禮》、《儀禮》、《禮記》不同的評價及相互關係的不同理解，漢代已成訟案。至宋代，一方面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¹⁷另一方面從歐陽修、蘇軾、蘇轍到胡宏、包恢¹⁸，不斷質疑《周禮》。如此等等，使舊話題增添了新命意，同時也給後起的禮學家設下繞不開的「路障」，必須面對並予回應。朱熹就有意構建新的禮學體系，並試圖會通「三禮」學。《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附以《禮記》和其他諸書¹⁹，同時朱熹又尊崇《周禮》。秦蕙田站在會通「三禮」的立場上，更竭力調和歷史上有關《周禮》、《儀禮》孰為本、末的議論，以此表達同樣推尊《周禮》和《儀禮》。

《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開篇即從周公制禮說起。首先引王通的話，「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繼而引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言：「《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針對陸德明說「『三禮』次第，《周》為本，《儀》為末」，而賈公彥則主張「《周禮》為末，《儀禮》為本」，《五禮通

¹⁶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見文集卷六十三〈答餘正甫〉書二。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改「附注者」為「附經者」，有校勘記云：「『經』字原誤作『注』，依浙監本改」。「德富古籍叢刊」本，臺灣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指定版本，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另，《讀禮通考》有一類不標明「乾學案」的很短的按語，低一格書寫。如卷十四：「《家禮》、今律文並同，《孝慈錄》、《會典》俱無，《會典》圖內有之。」「《政和禮》、《家禮》、《孝慈錄》、《會典》、今律文並同，唯《書儀》無。」

¹⁷ 語見《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9頁。

¹⁸ 包恢，南宋嘉定十三年進士，《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入其《敝帚稿略》。總目提要言：「恢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割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

¹⁹ 被《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經傳通解提要》援引的朱熹早年的〈乞修三禮劄子〉，就清楚表達了這個意見：「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文見《朱熹集》第569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朱熹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所以認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見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書四。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標點為「《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

考》以按語形式加以調和、折中、互補。這是《五禮通考》的第一則按語，署的名是該書編撰的重要參與人方觀承²⁰：

觀承案：陸氏謂《周》為本、《儀》為末者，《周禮》乃禮之綱要，《儀禮》乃禮之節目也。賈氏又謂《周禮》為末、《儀禮》為本者，《周禮》乃經世宰物之宜，《儀禮》乃敦行實踐之事也。

所以有學者指出：《五禮通考》「吞吐百氏，剪裁眾說。蓋舉二十二史，悉貫以《周禮》、《儀禮》為之統率。」²¹

（二）兼采經傳、史志、紀傳、儀制、會典、實錄、類書等各類載籍，搭建龐大的禮學知識系統

《五禮通考》不同於《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也有別於《讀禮通考》的內容僅限於喪禮，而是按五禮及分類條目，收羅自先秦至明代的各種資料，涉及經傳、史志、紀傳、儀制、會典、實錄、類書等各類載籍，「悉以類相附，詳歷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²²秦蕙田顯然遵從了徐乾學廣泛搜羅禮學資料的做法，並推而廣之。〈士喪讀禮通考引用書目〉（載《讀禮通考》卷首）揭舉了經史子集 631 種著作，而《五禮通考》的引用範圍更廣。以《五禮通考》卷四十五「社稷（城隍附）」為例，此卷敘述明代社稷和歷代祭城隍的禮制，其引資料的出處包括：《明史》（包括《太祖本紀》、《世宗本紀》、《禮志》、《樂志》、《張籌傳》等）、《春明夢餘錄》、《明集禮》、《續文獻通考》、《明會典》、《太祖實錄》、《成祖實錄》、《仁宗實錄》、《宣宗實錄》、《孝宗實錄》、《世宗實錄》、《太常紀》、《大政記》、²³《太平府志》、《北齊書》、《冊府元龜》、《宋史》、《元史》、《圖書編》、《日下舊聞（考）》和《圖書集成·城隍祀典部·藝文》、張九齡〈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李商隱〈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前人〈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前人〈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文〉等。正是其引

²⁰ 方觀承，字宜田，著名學者，桐城人，方苞之侄，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有其〈五禮通考序〉。文淵閣四庫本卷首有蔣汾序（作於乾隆十八年）、顧棟高序（作於乾隆十七年）和秦蕙田自序，未收入方觀承序。

²¹ 盧見曾：〈五禮通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1423 冊第 454 頁。盧見曾，字抱孫，德州人，與秦蕙田交遊頗深。

²² 同注 2。

²³ 據《明史·藝文志》：《太常紀》，呂鳴珂撰，二十二卷；《大政記》，雷禮撰，三十六卷。

述文獻之宏富，搭建的禮學知識系統之龐大，才獲得「絕無僅有」之稱。

（三）打通禮經（經典）和儀制（操作）的界隔，創擬「五禮」新體系

《五禮通考》卷首有兩篇相對獨立的文字，一是〈禮經作述源流〉（分上、下），一是〈禮制因革〉（分上、下）。²⁴〈禮經作述源流〉分「禮經作述大指」、「經禮威儀之別」、「禮經傳述源流」三部分。「禮經作述大指」究詰《周禮》、《儀禮》、《禮記》的禮書性質及其關係，有 2 則按語，第一則前文已揭引（即「觀承案」），第二則是針對前人所謂「武帝嘗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本文作者按：指《周禮》）不立學官，而何休詆為戰國陰謀」一說而發，文字不長，如下：

宗元案：《十論》、《七難》乃林碩作，非武帝也，此誤。²⁵

「經禮威儀之別」主要討論如何理解「經禮三百」與「曲禮三千」。編者未出按語，全部靠引述。²⁶「禮經作述大指」和「經禮威儀之別」兩部分，共援引了歷代 20 多位著名學者的觀點。²⁷

「禮經傳述源流」以正史的藝文志、經籍志為主要依據，參以《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和其他史傳資料，介紹歷代禮經的傳述。這部分內容有點類似於目錄學的記敘，敘說的次序是：《周禮》，《儀禮》，《禮記》，最後是「三禮」和雜禮。有「蕙田案」按語一條。

〈禮制因革〉概述明代（含明代）以前禮制的製作和演變，所引資料從《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左傳》、《國語》而下，以正史的「禮志」（「禮

²⁴ 《五禮通考》卷首三題名〈禮制因革上〉，《五禮通考》卷首四題名〈禮制因革下〉，但在〈目錄〉中，〈禮制因革〉卻被易名為〈歷代禮制沿革〉。〈禮經作述源流〉、〈禮制因革〉（〈歷代禮制沿革〉）凡 4 卷，加正文 262 卷，所以《五禮通考》總計 266 卷。

²⁵ 宗元，即宋宗元，字慤庭，元和人，與秦蕙田交遊頗深，參與編撰《五禮通考》。

²⁶ 所引用的第一則材料是：孔氏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

²⁷ 其中有：隋朝王通，唐代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韓愈，宋代程顥、程頤、周諤、呂大臨、晁公武、楊時、葉夢得、朱熹、王應麟、馬廷鸞，元代熊朋來、敖繼公，明代湛若水、童承敘、王志長、郝敬，清代徐乾學、萬斯大、姜兆錫。

書」、「禮儀志」、「禮樂志」)為主體,結合《唐會要》、《唐六典》、《玉海》、《通典》、《續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元典章》、《大政記》及其它史志、史傳、官簿,兼及《朱子家禮》和邱浚的《大學衍義補》等等。有4則按語。²⁸其獨到的視野和敘述,勾勒出一部簡明的中國禮制發展史,具有創新意義。

還須垂注的是,〈禮經作述源流〉和〈禮制因革〉猶如全書的兩篇總綱,「五禮」通考是綱舉目張之產物。唯此「綱」由兩天主線(禮經與禮制,或儒學典籍與官府儀制)交錯、融合而成。從而,《五禮通考》創擬了一個具有新意味的「五禮」體系。

二、

《五禮通考》篇幅之大,不但在《四庫全書》的禮類、而且在整個經部著述中,都排名第一。能與之頡頏者,只有經部之外的一些巨構,如《宋史》、《明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六藝之一錄》等。前文論及的《儀禮經傳通解》(原三十七卷,缺卷十五;其中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七卷因非朱熹親定仍題名《儀禮集傳集注》)及黃幹、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在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合為2冊,其中《儀禮經傳通解》為604頁,《儀禮經傳通解續》是1044頁。即以這等規模,《儀禮經傳通解》的撰作,已著實讓朱老夫子一輩子都操心不完。²⁹那麼,煌煌《五禮通考》究竟是如何撰作完成的,就不能不引發人的興趣了。

秦蕙田位居高官,且勤政實幹,³⁰這使他必定喪失大量可用於治學的時間,不同於職業學問家。但另一方面,因為位高權重,加之自己的出身、眼界、學養等等而形成的人格魅力,卻讓他又有條件吸引和羅致人才,調動各種資源,借助眾手協力修書,這顯然是《五禮通考》得以完帙的很重要原因。秦蕙田於乾隆元年(1736年)考取進士,後仕途順遂。至十年(1745年),已遷為禮部右侍郎。後調任刑部侍郎,又擔當經筵講官。其後,更升任工部尚書、刑部尚書,

²⁸ 全部是「蕙田案」,且全部在〈禮制因革·上〉(唐以前部分)。茲引其中一例,以見一斑:「蕙田案:禮莫盛于成周,漢興三百餘年,西京未遑製作。雖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諸人,班志所載,僅存議論。惜哉。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三代』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

²⁹ 束景南《朱子大傳》曾描述在朱熹率領下,如何集體編寫《儀禮經傳通解》,並形象地說,朱熹一度組織了三套寫作班子分工合作、齊頭並進。見該書1012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³⁰ 有關秦蕙田生平,可參見《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等。

並加太子太保，還兩次擔任會試正考官。因此，秦尚書身邊能夠團聚一批有才學的人士，共襄盛舉。自秦蕙田因父喪回籍丁憂，杜門讀禮，受《讀禮通考》啟發而撰作《五禮通考》，即有早年好友吳遵彝共同勉力。其後秦蕙田回京，仍得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諸人的合作幫助。《五禮通考》初稿成型後，又邀請了一大批學者參與校訂。

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第一」題名之下，署有：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禦史桐城方觀承同訂，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按察使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該本〈五禮通考總目上〉和〈五禮通考總目下〉題名之下，還署有：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監理樂部大臣協理國子監算學前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監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³¹這直接記錄了一部分撰作實況。

又，徐世昌《清儒學案》卷六十七載，當時加入《五禮通考》校訂工作的有：「金匱吳氏鼎，德州盧氏見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錢氏大昕，王氏鳴盛，休甯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吳江顧氏我鈞。其吉禮屬吳氏、盧氏、顧氏。嘉禮屬錢氏者，昏、饗、燕、鄉飲酒、學諸禮，及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兩大類；屬王氏者，射、巡狩；屬戴氏者，觀象授時一大類。賓禮全屬錢氏。軍禮全屬王氏。凶禮屬錢氏、沈氏、吳氏、盧氏。惟宋氏所參校者十及八、九，統校全書則屬諸山陽吳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預參校。」³²其中承擔軍禮和嘉禮的射、巡狩部分校訂的王鳴盛（1722—1797年），乃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十七世商榷》的作者。承擔賓禮和部分嘉禮、凶禮的錢大昕（1728—1804年），其所著《廿二史考異》是另一部考史名著。所言戴氏，為戴震（1723—1777年）。僅此三位巨擘，已足見這個修書班子底蘊之深厚。雖然，王、錢、戴當時尚屬年輕，然也唯因如此，才有可能加入到他人的著述活動中去。

從錢大昕下面的話中，可以確定秦蕙田屬於學者型的官僚，為學、向學之心終生不渝，同時獎掖後進，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

公（本文作者按：秦蕙田）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為諸生時。後進有通經

³¹ 文淵閣四庫本沒有類似的記錄。另，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六十七〈味經學案〉載：「（《五禮通考》）書成，方恪敏觀承見而好之，同為商訂，故並列名焉。」臺灣中華大典編印會等1967年出版。對此，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亦有交待。

³² 《清儒學案·味經學案》。該段文字之後，緊接著又言：「而卷中未分注名氏。」

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紀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彝、龔繩中為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同其說，故與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繼而值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為後學宗。……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³³

王鳴盛的紀錄更可證明秦蕙田不僅組織眾人修撰《五禮通考》，更實質性的主持其事，親自參加討論和寫作。

公每豎一義，必檢數書為佐證。復與同志往復討論，然後筆之。故其辨析異同，鋪陳本末，文繁理富，繩貫絲聯，信可謂博極群書者矣！³⁴

方觀承的〈五禮通考序〉，則從另一側面提供了瞭解合作者之間關係的管道：

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本文作者按：方苞）奉詔纂修《三禮》，餘數從講問。……因以所著《喪禮或問》授餘。既而閱昆山徐氏《讀禮通考》，乃知聖人立中制節。《或問》實揭其精微若載。《或問》於喪禮補吊、荒、禭、恤之制，則凶禮已全。准是而師朱子輯禮本意，博采經傳子史，區為吉、嘉、賓、軍四類，而匯成《五禮全書》。庶幾經世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後也。吾友味經先生以博達之材，粹於禮經，官秩宗，日侍內廷，值聖天子修明禮樂，乃益好學深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婚、學校，各以類附。於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先生向與伯父論禮，因屬余參訂，爰考歷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有所見輒附於其間。非謂能折中禮制也。……是書體大物博，先生積數十年搜討參伍，乃能較若

³³ 錢大昕：〈文恭公墓誌銘〉，《潛研堂文集》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9冊第158頁。

³⁴ 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434冊第318頁。

畫一。³⁵

由此，我們就可排除圍繞《五禮通考》成書問題上的一些不實之辭。如梁啟超說：「（徐乾學的《讀禮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³⁶這既缺乏依據，也有悖情理——試想，如此浩大的修書工程，豈是憑萬斯同（字季野，1638—1702 年）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須知，萬斯同一生不僅「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同時還有大量的其他各種著述。

³⁷

這就碰及中國古代一種撰作活動的類型（宋代以後開始多見，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亞類型）。集體參加或借助他人之力是其基本特點，但號召力和凝聚力（也可以說是驅動力）卻有所不同。像朱熹撰作《儀禮經傳通解》，最初曾想尋求朝廷的支持，³⁸但最後還是憑藉其導師和精神領袖的身份，來加以組織和動員。秦蕙田撰作《五禮通考》（包括此前的徐乾學、稍後的阮元等）則略微複雜一些。我們應該正視這種「撰作活動的類型」，這對理解《五禮通考》的價值和特點是有幫助的。當然探討這種類型已越出本文的主旨，所以點到為止，容日後再作展開。

秦蕙田的家庭背景和個人閱歷，為他以會通之方法研究禮學，撰作《五禮通考》，提供了圖書資料方面的必需條件。秦蕙田生於江南世家，宋代秦觀第二十六世孫，祖父、父親都享有文名，通經學、擅詩詞。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言：

予與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疏義外間絕少刊本而度貯緘題者，數十筭。宗伯以絕人之姿，盡發而讀之，早歲即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匯為一編。³⁹

³⁵ 方觀承：〈五禮通考序〉，聖環本《五禮通考》卷首。

³⁶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第 194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5 年。

³⁷ 同注 34，第 193-194 頁。至於徐乾學《讀禮通考》的成書，可參見《四庫全書總目·讀禮通考提要》：「蓋乾學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眾力以為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168 頁。

³⁸ 參見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569 頁。

³⁹ 蔣汾功：〈五禮通考序〉，載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禮通考》卷首。這裏所言「匯為一編」，當指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所講少時在「讀經之會」基礎上，「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裒然漸有成秩矣。」

等到秦蕙田「供奉內廷，以見聞所及，時加厘正。……服闋後再任容台，遍覽典章，日以增廣。」⁴⁰長期在京城上層活動，使其有條件接近各種資料，拓寬視野，為學術研究創造了便利。

《五禮通考》絕少涉及本朝，並從體例上框定「通考」的下限只及明朝。《五禮通考·凡例》最後說明：「洪惟我朝，聖聖相承，制度修明，日新富有。至於科條所頒，敬切訓行，高深莫贊。蕙田叨佐秩宗，疏陋是懼，復理專門故業，略識源流，抑亦退食寢興無忘匪懈云耳。」這裏對於《五禮通考》敘述考辨為何「迄於前明」，並不詳解，語意晦澀。這一做法似乎有必要聯繫其家庭背景加以考量。雍正時，蕙田之本生父秦道然因皇室內部的矛盾而受牽連，下獄一關就是九年。至秦蕙田進士及第，「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遂上疏向乾隆皇帝「乞恩」：希望父親在「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奪職效奔走以贖父罪」。乾隆皇帝乃赦宥其父。⁴¹家庭中如此深重的創痛，必然會對秦蕙田的為人處世包括治學的內容與形式，產生影響。史稱秦蕙田「治事勤敬」⁴²、「恪勤素著」⁴³，恐怕即是其中的一個面相。而儘量回避對本朝的評論，則可能成為另一種生存策略。

秦蕙田自稱「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為詞章淹貫之學」，從小即留意於經學，「塾師授之經，循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⁴⁴這固然可以從一個角度解釋其對學問的選擇，然而同樣不可忽略的是，秦蕙田後來長期從事實際政務工作的經歷，必然會強化其對「踐履」的重視與強調，主張學以致用。這也就為其盡數十年之力不倦於《五禮通考》的撰作，提供了持久的動力。進而，也會不斷地促使他融通各種學說和知識，致力於禮學的會通。秦蕙田和《五禮通考》，能獲得同樣身為官宦的曾國藩之理解和贊慕，似有內在關聯。

不可忽略的還有，秦蕙田的出生地、成長地無錫（雍正時拆為金匱縣）的地域文化，對《五禮通考》撰作的影響。明清時期，工商文明已在江南一些地區蔚然興起（無錫具有代表性），其講求實際和實用的價值取向，與經世致用的學風互為推助。還有，徐乾學乃崑山人，其地與無錫甚近。《五禮通考》寫作班

⁴⁰ 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⁴¹ 《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傳」，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0503-10504。

⁴² 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冊538，頁387-388。

⁴³ 《清史列傳》卷二十「秦蕙田」引乾隆皇帝上諭，中華書局王鍾翰點校本，頁1480。

⁴⁴ 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

子中，錢大昕、王鳴盛都是嘉定人，嘉定與無錫同在蘇南。而戴震、方觀承，也毗鄰江南文化圈。這一切，肯定有地域文化上的關聯存在。

三、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禮樂廢壞兩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⁴⁵朱熹的話，或許能代表宋代以後一些文人儒士的思想與情志，並且，這種情志與思想投射到了禮學研究之中。禮學，成為寄託社會理想、寄寓治世良方的學問。

乾隆元年（1736年）詔開「三禮館」，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欽定周官義疏》、《欽定儀禮義疏》、《欽定禮記義疏》。繼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頒定《大清通禮》。由此新一波的禮學研究浪潮，在朝野上下蔚然興起。秦蕙田置身其間，以《五禮通考》的撰作貢獻於世人。

晚近，學人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和《清初三禮學》⁴⁶等成果問世，對於十七、十八世紀禮學的啟承轉變作了深入的梳理、闡說，多有發明。但秦蕙田和《五禮通考》於此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未得到正面的研究，從而留下重要的缺環。劉廣京先生慧眼洞見，1999年在給張壽安《以禮代理》大陸版作序時，結尾處就特意提到，秦蕙田完成《五禮通考》，「時已屆戴震（1723—1777）著述之年，與張先生本書所論時代已可銜接。世運推移，而學則垂久。後世論禮學及情欲之學，皆有所本矣。」

當年，王鳴盛〈五禮通考序〉對秦蕙田治學取向及其特點有極精要的總結：「秦公味經先生之治經也，研究義理而輔以考索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針對別人誤以為《五禮通考》不過是「補續徐氏」，秦蕙田曾特意向王鳴盛申明：「此蓋將以繼朱子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⁴⁷其禮學的抱負一言以明。

假如用一個字來概括《五禮通考》所代表的秦蕙田的禮學的話，大概就是

⁴⁵ 《朱子語類·禮一·論考禮綱領》，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177。

⁴⁶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張氏另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刊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林存陽：《清初三禮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⁴⁷ 同注34。

「通」。除了本文第一部分論說的三個方面，「通」還表現在：漢學、宋學兼采，義理與考索之學相結合，以禮學經世為指歸，廣綜博攬。

反映在「五禮」的內容和範圍上，其「通」的特點也是超越前人的。如「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此舉後引起四庫館臣的議論，以為：「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好在秦蕙田當初就已說明：「《通考》將田賦、選舉、學校、職官、象緯、封建、輿地、王禮各為一門，不入五禮。而朱子《經傳通解》俱編入王朝禮，最為該恰。今祖述《通解》，稍變體例，附於嘉禮之內。」⁴⁸由此，四庫館臣緊接著前面那句話，又將語氣緩轉過來，說：「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為無據。」⁴⁹正是秦蕙田這種融通的視野和手法，贏得了曾國藩的高度讚譽：「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⁵⁰

至此，本文用「通禮」來概括《五禮通考》的著述形態。這既是一種新的禮書編撰形式，也包含著禮學的一種新形態。秦蕙田在禮學史上的最大業績，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一著述形態。

然而說到「新」，自然是有局限的。最關鍵者，莫過於歷史觀。茲引用兩段話，來反映秦蕙田的歷史觀——

1、乾隆〈御制重刻文獻通考序〉：「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蒼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事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為之折中。」⁵¹此雖非出自秦蕙田之手，亦未為其所引，卻與其禮學思想極相合。

2、《五禮通考》卷首第一〈禮經作述源流上〉：「朱子曰……《周禮》乃周

⁴⁸ 〈五禮通考·凡例〉，《五禮通考》卷首。

⁴⁹ 《四庫全書總目·五禮通考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頁179。

⁵⁰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詩文》，頁256。該文接著又說：「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傳于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故如是也。以世之多故，

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發固已衰矣！」

⁵¹ 中華書局影印本《文獻通考》卷首，頁1-2。

家盛時聖賢製作之書。《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周官》遍佈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五禮通考》既是這種歷史觀的產物，也成為表達和維護這一歷史觀的工具。

受這種歷史觀指導所進行的以考辨、折中為主要手段的學術工作，其意義究竟幾何，自然就令後人生疑。「新史學」倡言人梁啟超，就強烈地質疑此前的禮學研究：「這門學問到底能否成立，我們不能不根本懷疑。」⁵²

現在看來，「懷疑」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由懷疑而邁向更高的認識水準。本文是向著這個目標而進行的一項基礎性研究，希望借此瞭解，古代禮學在步入終結前最後一段歷程的一些具體情況。

⁵²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頁312。

